

理查德·弗兰纳根对话余华:

小说只会抛出问题,却不会给出答案

对话



3月16日至24日,2018年澳大利亚文学周系列活动在中国多个城市举行。文学周期间,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兰纳根、亚力克西斯·赖特、菲奥娜·赖特、夏洛特·伍德等与中国作家和学者就文学创作的不同问题展开交流。3月17日,布克奖得主理查德·弗兰纳根与中国作家余华围绕历史题材小说的叙事和创作传承等话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余华:今年澳大利亚文学周介绍了四位作家,但很遗憾我只读过理查德·弗兰纳根的《深入北方的小路》和亚历克西斯·赖特的《卡彭塔利亚湾》。当读完一部了不起的小说后,要想口头复述小说中的某些内容时,你就会发现精彩的东西都溜走了,很难复述,《深入北方的小路》就是这样的作品。这部小说的时间是错位的,有现在也有过去,过去也有不同的时间,所以小说中有现代的人物也有过去不同时间里的人物,但主要人物都在第一章的回想中,或是那种恍惚的回忆里出现。当我读第一章时,就被弗兰纳根叙述的分寸和对节奏的把握吸引了,非常美妙。作为作者,他一直都想打开这部小说的门,寻找他的路通往什么地方。第二章以后,故事一下子打开了。我自己最钦佩的是第三章,从写作角度来看,第三章是最难写的,弗兰纳根写到澳洲的事情,还有在东南亚修铁路,饥饿、疾病、瘟疫流行,各种各样的生活……从弗兰纳根选择写什么,又怎么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你就知道这家伙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一开始读余华作品时,也是深受震动。我觉得余华作品中具备了非常多当代文学的优秀品质,而且这些品质是现代很多西方文学作品所不具备的,特别是他的故事。他小说的故事性非常吸引人,有张力,能在一开始就迅速抓住读者不断地阅读这个故事,而且往往是把故事读完才能真正感受到他深厚的写作功力和独立运笔。余华的书让我觉得真正好在哪里呢?他有一种西方作者现在所不具备的共情。我记得契诃夫曾经说过,真正好的作家应该是生活在黑暗中的,他们应该和那些命运不太好的人共同相处,来了解他们的情绪,这样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就好比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作为一个好作家,你必须要了解这些人的处境,才能更好地写出

优秀的作品。我阅读的余华的第一部作品是《活着》,第二部作品是《十个词汇里的中国》,他通过自己的童年回忆和对琐事的描写以小见大,充分揭示了过去50年中国深刻的发展与变革。我有一个问题给余华,我知道威廉·福克纳对你的写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其实他也对我的写作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那么我想问,福克纳对你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哪里?

余华:威廉·福克纳是我的第三个老师。我很年轻时走上写作的道路,在写作的每一个阶段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其中困扰我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心理描写,我不知道如何过心理描写那关。因为当一个人内心平静时,他的心理是可以描写的,但平静的心理是不值得去描写的;但当一个人内心动荡不安时,是值得去描写的,你却发现写几万字都描写不出来。后来我读到了威廉·福克纳的一个短篇小说,小说里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杀了,看着尸体倒在美国南方的泥土上,阳光下血在流淌,又看着刚刚生下孩子的女儿的样子,那个人的心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威廉·福克纳写了很长的一段,方法很简单,他把用杀人者麻木眼光所看到的事物罗列出来。我发现杀人者内心的状态被非常准确地表现出来了。为此我又去读了以前读过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里面有好几页关于拉斯柯尔尼科夫杀了老太太以后状态的心理描写,没有一句心理描写,全是动作,但表现出那种紧张、惊恐不安。威廉·福克纳教会了我如何对付心理描写,心理描写这个词是不存在的,是不写小说的教授虚构出来吓唬写小说的人,威廉·福克纳给我的帮助就在这儿。

理查德·弗兰纳根:威廉·福克纳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他对于平凡的小人物的描写,哪怕是在微不足道、往往被遗忘的人物,在他的作品中都展

示出丰富的内心以及复杂的情绪,在他作品中,再平凡的人、再小的人物都保有尊严。

我来自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那是一个岛屿,离澳大利亚其他地方最近也有100公里远。我住在热带雨林的的一个小镇上,镇上只有200余人,主要以矿业为生,大多数是二战后逃到这里的难民。我成长过程中,身边没有一个人是作家,也没有人认识所谓的作家,当时我们都觉得作家只有那些欧美人才能当。读了那么多欧美文学作品后,我觉得似乎只有小说里那些欧美人的生活才重要,我们的生活好像就没那么重要,因为此前从来没有谁会描写塔斯马尼亚的生活,没有人去描写我们生活中的悲喜与起伏。威廉·福克纳和我,还有余华,有一个共同点:我们都是南方人。威廉·福克纳来自密西西比,一个当时在美国也不太受重视的地区。当我读到和我有类似背景的福克纳的作品时,我发现原来自己也可以像他一样描述我的生活。

福克纳的作品通过简洁的语言呈现出不同人物的不同状态,这一点我在余华的作品中也体会到了。在他的小说中,可以轻易分辨出哪句话是谁说的,每个人物各自有怎样的特色,读起来好像挺容易的,但写起来真的很难,需要非常深厚的功力才能完成。

刚才余华说有三位老师,其他两位老师是谁?

余华:第一位老师是日本的川端康成。我在20岁时读到了他的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可能那时我也很多愁善感,此后就迷上了川端康成,一直在读他的小说,向他学习写作。阅读和学习了大概四五年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小说越写越差,没有自我了,川端康成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翅膀,而是捆住我的枷锁。我掉到了川端康成的陷阱里,但我运气很好,当我在川端康成的陷阱里大喊救命时,卡夫卡从旁边经过,一把把我拉了出去,他是我第二个老师。

我最初读的并不是卡夫卡最著名的《变形记》,而是《乡村医生》。我读完后就傻了,心想,书里的一匹马想有就有,想没有就没有,那么自由,我就知道该如何写作了。卡夫卡教会我的不是写作技巧,而是教会我写作是自由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从此以后我越写越自由。但我现在还是非常感谢川端康成,当我刚走上写作道路时,花了四五年训练自己如何描写细节。细节是非常重要的,无论小说的结构是大或小,线条是粗还是细,都不能缺少细节。小说有生命力的重要部分都靠细节传达。我们经常读到这样的小说,情节编得天花乱坠,但读完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因为缺少细节。

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大概是2008年,我去日本为《兄弟》做宣传,对采访我的记者说,川端康成是我的老师。那些日本记者觉得川端康成的小说那么优美,你的小说……我说那不就是粗俗嘛,粗俗也是小说的风格。他们承认粗俗是小说的风格,但他们想不通怎么会是川端康成的学生。我告诉他们,当一个作家对另外一个作家产生影响时,就好比是阳光对树木产生影响一样。重要的是,树木受到阳光的照射后,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而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川端康成就救出了像我这样的学生。

理查德·弗兰纳根:我一开始写作时,觉得必

须要有很好的写作技巧和高深的写作功力。但后来我发现写作上还有更重要的因素。任何成功的作家,他们是通过语言和作品传达出他们的内心。这说起来容易,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很多作家并不能真正以他们的手写他们的心。我觉得每个作家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试图探索怎样真正呈现心声。

确实,不同的作家多少会对其他作家产生影响。我记得博尔赫斯说过,每一位作家都会产生属于他自己的影响力。卡夫卡对我也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读过他很多的小小说,其中一篇是《在流放地》。我所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在历史上有一部分属于英国殖民地,曾被英国当作政治犯或反动分子的流放地,所以现在塔斯马尼亚土地上所居住和生活的,要么就是流放犯的后代,要么是原住民的后代,而原住民在历史上也经历过大屠杀。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经历了不同的苦难,之后100年中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因此深受影响,我从小就一直生活在这段历史上的阴影中。我喜欢卡夫卡的《在流放地》,在这个故事中,一个男人进入了一个殖民地,到了那里的人身上会被打上非常多的图案和文身,告诉你犯了什么罪名,但你并不知道所犯何罪。在读这部作品时,我看到故事里的人物身上被印满欲加之罪,而他自己也不能理解这些罪名时,不禁想起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这片土地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卡夫卡对我的启示就是,在你揭露现实的时候,未必需要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有时候从非现实的角度来写,能够更深刻地揭露现实。

余华: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深入北方的小路》并不是写你成长的塔斯马尼亚的书,它写的是二战的故事。哪些书写了你成长的地方?

理查德·弗兰纳根:除了这本,其他的书比如我的第一部小说《河流尽头人之死》,还有一个《巴掌能拍响》《古尔德的钓鱼书》《欲望》等都是关于塔斯马尼亚的。

我想先解释一下我的写作方式或习惯。完成一部作品后,再写下一部新作品时,我总希望突破自己,我不愿意重复自我,但我知道有些作家在一部书或是成功之后,都会走老路子。我觉得作为作家,写的一字一句都是力求传达我们的心声,当然作家有高超的写作技巧来传达真实的声音,但如果每一本书都写得比较类似,最后原本的真实可能就会变成谎言。所以,如果作家觉得写作轻而易举时,写得往往都不是真实的。

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写《深入北方的小路》这部书。二战时期,我父亲不幸沦为日本战俘,被带到缅甸去修缅甸泰死铁路,我们就成了“死亡铁路的孩子”。这段死亡铁路的经历深刻影响了我的童年生活,我们会听父亲说起以前的故事,我父亲因为这段经历也会有些怪异行为,他最后对物质上的成功没有任何兴趣。我很怕写这本书,写好它太难了。但后来,我内心有个声音越来越强烈,明确知道我必须写这本书,如果不写的话,我可能写不出别的东西了。我前后总共花了12年,最终写成这本书,我总共写了5个版本,这5个故事中的人物不同,剧情和写作技巧也不一样。

写作时还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在父亲在世时完成,当时我父亲已非常年迈,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这赋予我写这部小说的一个新动力。

■瞭望台 石黑一雄《浮世画家》:

一幅日本民族性的浮世绘

□梅进文

《浮世画家》是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裔英籍作家石黑一雄在1986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了一个性格鲜明的主人公小野增二,学界对此也进行了多角度解读。有研究者认为小野是一个惯于自欺的人,“具有将自己的愿望和恐惧移位或投射到他人身上的倾向,从而逃避面对自己的感情”。也有人指出小野增二有一种注重浮名、善于伪装的基因。从民族性切入石黑一雄的创作,再结合他的日裔身份,会发现无论他本人如何称自己写的是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人与事,作品里却始终带有一种探索日本国民性问题的影子。石黑一雄通过对小野增二的描绘,使读者看到了日本民族性的特征之一:投机性。

《浮世画家》中的故事以二战前后的日本为背景。小野增二刚出生不久,一个云游僧就曾断言,“增二肢体健康,但天生有个弱点。这弱点会使他耽于懒惰和欺骗。”起初,小野父亲并没有当回事,“可是在增二成长的每个阶段,我不得不承认那个老头的话是有道理的……我们必须不断对付他的懒惰、他的不实际,以及他的意志薄弱”。对于一位容易懒惰、不实际且意志薄弱的艺术家来说,投机的方式是最有可能达成所愿的。不可否认,小野不愿意继承家里生意而选择绘画部分是出于爱好,但更多是源自内心升腾的赚大钱、扬名立万的思想。他认为,父亲的“商会”只是一小时接一小时地数小钱,点硬币,感到厌恶,而他投身艺术则是希望实现一种“数小钱,点硬币”不一样的梦想。追逐利益和名气成了他从事艺术的一个根本动力,他也将此作为在人生路口作选择的一个基本原则。

小野曾向两个老师学习,最初跟随专门从事商业绘画的竹田,后来转投画家森山诚二(毛利君)门下。他这么做的理由表面上是为了追求艺术的更高境界,森山“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他认为我留在竹田大师这里会对我的天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然而同伴“乌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行为本质上就是背信弃义,是不忠的表现。小野干脆撕破伪装,“竹田大师不配你这样的人为他效忠。效忠不是白给的”。条件简陋,工作辛苦,学徒阶段的薪酬也不会太高,更谈不上显赫的社会地位,这些才是导致小野背叛师门的真正缘由。

如果说小野对于竹田的背叛是因为追求功名利禄,那么对毛利君的不忠则是这种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毛利君提供的学习生活场所是阔气的别墅,作为老师的水平也很高,但这并不能满足一个投机者内心对于“成功”的渴望。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前夕,军国主义鼓噪整个日本,大量投机分子从中看到了人生“崛起”的机会。当武田协会的松田向小野鼓吹,走出艺术象牙塔为所谓的现实世界服务时,小野似乎看到了自己“光明”的前途。松田启发小野离开毛利君加入“冈田—武田协会”,“为了帮助你这样的人睁开双眼,为这个时代创作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这话很有蛊惑性,他将个人命运和所谓“大时代”勾连起来,当时日本为国而战的军国主义者绝不止松田一人,小野只是为长期以来蠢伏的野心寻找突破口罢了。于是,他将绘画内容从毛利君要求的捕捉瞬间即逝的美转移到“爱国”题材。画作《得意》就是代表,画面“左下角用较小的字体写着‘可是年轻人准备为尊严而战’”。离开毛利君后,他全身心投入到“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的绘画上,这次投机性的转向成为小野迈向人生“辉煌”的开端。

小野增二是非常典型的自私自利型的投机性格,这样的人在历史风云面前看到的只是自己的机会和前途,其他一切都是他们的工具而已。石黑一雄通过小野增二反思日本国民性的问题,同时他也认为这种性格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动态

《使女》读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近日,上海译文出版社在京举行《使女的故事》读书分享会,作家梁鸿、徐则臣、张楚、黄昱宁等共同探讨了小说的创作主题及其所关注的社会现实。

《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小说写于1984年。作家将故事设定在未来,在基列共和国,女性成为一种生育工具。小说出版后曾引起较大反响,被改编成电影、戏剧、歌剧、芭蕾舞剧等多种形式的作品。2017年,由小说改编的电

视剧《使女的故事》上映,获得金球奖和艾美奖的多个奖项,引起轰动。

在分享会上,梁鸿谈到,该书虽然写于30多年前,但具有强烈的现实所指,它既能深入到社会现实内部,关注社会内部发生的事情及其纹理和走向,同时又因为象征性和隐喻意义而具有超越性。作者阿特伍德有深厚的现实关怀,在写作中也做到了既深入其中又拔出其外。她认为《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未来小说,有科幻的因素,但更多的是政治、文化、历史方面的内容。

徐则臣认为,阿特伍德在《使女的故事》中表达了一种不会过时的洞见,她提供了表现现实的另外一种方法,除了通过写历史借古喻今之外,也可以通过写未来来反映现实。

张楚认为,与诺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相比,阿特伍德的小说色彩更为明丽、鲜艳,或者更为立体。如果说门罗的小说像一条很平静的河水,阿特伍德的小说则更像海浪,浪花击打岩石后散开,在阳光下闪烁出不同的颜色。在长篇小说方面,阿特伍德更像是文体家,一直在进行各种实验和尝试。



欧洲移民在塔斯马尼亚生活场景的壁画。

谢菲尔德壁画小镇上关于早期欧洲移民在塔斯马尼亚生活场景的壁画。

世界文坛

SHUO WEN TAN